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长三角研究系列

CHANGSANJIAO ZHUANXING SHENGJI YANJIU

长三角转型升级研究

刘志彪 郑江淮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度课题研究成果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ZHONG GUO JING JI WEN TI CONG SHU

长江三角洲研究系列

长三角转型升级研究

CHANGSANJIAO ZHUANXING SHENGJI YANJIU

刘志彪 郑江淮 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三角转型升级研究/刘志彪, 郑江淮等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12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长三角研究系列)

ISBN 978-7-300-16489-2

I. ①长… II. ①刘… ②郑… III. ①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2907 号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长三角研究系列

长三角转型升级研究

刘志彪 郑江淮 等 著

Changsanjiao Zhuanxing Shengji Yanji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10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0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作者目录

学术顾问：洪银兴

主编：刘志彪 郑江淮

各章撰写人

序言 刘志彪

第一章 葛扬 管陵

第二章 郑江淮 黄永春

第三章 刘志彪

第四章 郑江淮 杨以文

第五章 刘志彪

第六章 魏守华 吕新雷 从海燕

第七章 魏守华 刘小静 程穆

第八章 李晓春 夏娟

第九章 王宇 郑江淮 刘志彪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总 序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 (代序)

刘志彪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无疑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全球化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宝贵的机遇，使中国能够利用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但是自从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中国需要与世界经济进行再平衡。过去那种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基于出口导向的第一波全球化发展的红利已经透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亟待转型升级。

对经济全球化战略进行转型升级，并不是像某些舆论所说的那样，中国应该回归自力更



生的内向型经济，恰恰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提供的争先进位的黄金机遇，在机遇稍纵即逝的千载难逢时刻，及时启动中国第二波加入或者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或者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这是中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和条件下，全面获取新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战略。

“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要建设名列世界前茅的内需市场。这个战略目标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经济全球化战略，更并不意味着回归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而是要把扩大内需与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利用内需市场与全球市场之间的关联关系，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创新要素，服务我国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从而加速我国达到全面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宏伟任务。

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虽然是我们对中国发展趋势和要求的一个较新的事实归纳和提法，但它并不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目前，全球那些人口和潜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经济形态。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第一，美国民众的收入水平高，购买力强且人口众多，这些都使美国的最终需求规模一直居于全球第一的地位，同时也是形成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市场驱动型的全球市场治理者的主要条件；第二，强势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上其他非经济因素，塑造了长期的强势美元地位，诱使全球生产要素向美国流动，导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对其进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国可以长期获得低成本的要素和产出品；第三，美国因国内市场巨大和吸引力强，成功机会众多，也是吸收全球各种要素尤其是高级的创



新要素的力度最大的国家，如美国就是当今发达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顶尖人才富集度最高的国家。

美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其自身的条件和复杂的背景，如消费文化和政治军事实力等。但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无疑是中国作为大国经济的主要发展战略。本文将对这一战略的基本背景、内涵以及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全面的剖析。文中许多观点是基于我最近的思考，还不是很成熟，现在提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必须尽快启动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基本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尤其是 1992 年以来，中国坚定地走开放经济的道路，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紧抓加入 WTO 的历史性机遇，利用自身优良的投资环境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大力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全球化放松了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不仅直接推动了贸易的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我们把由此获得的增长称之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

从要素流动的角度看，中国参与的第一波全球化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既表现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关系的变化，也是我们现在亟待转换全球化战略的主要理由：

第一，中国是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但同时却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成为世界物质资源消耗的大国。在完整的商品和服务



链条中,物质资源消耗和占用主要发生在加工/制造/装配/生产环节。中国在价值链底部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必然是接受和转移西方消耗的主要国家。即使中国原来的资源消耗总量不变,但是随着西方世界通过产品内分工的形式把那些高消耗、高占用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消耗和占用的水平也会不断提升。西方发达国家解脱了高消耗和高占用环节后,专注于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和设计、品牌和营销环节,而我国被锁定在卖劳力和拼消耗的生产加工环节,其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进程,必然体现为主要依靠物质消耗和占用的粗放发展方式。这从间接资料也可以看出端倪,如2001—2010年,世界品牌价值咨询机构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的100个品牌排行榜中,均没有中国品牌入选。另外,目前国际标准有24 807项,而中国主导制定的只有103项,仅占0.42%。^①

第二,中国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却作为穷国在为富国进行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1 975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外国来华投资15 838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负债的60%。这充分说明,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结构分布较为集中,其中对外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以外汇储备为主;而对外金融负债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门的直接投资上。^② 这一格局的直接和间接

^①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魏传忠:《我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参见 http://intl.ce.cn/sjj/qy/201112/08/t20111208_22900637.shtm, 2011-12-08。

^② 聂伟柱:《中国去年已成最大资本净输出国》,参见 <http://dycj.y.net.com/3.1/1112/06/6569942.html>, 2011-12-06。



的融资效应主要表现为：（1）通过吸收 FDI 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这种依赖低端要素的竞争性出口不断地压低出口价格，降低了富国（作为进口国）的企业尤其是其高端制造业企业的投入成本；（2）中国接受富国的制造业外包，减少了富国对工厂设备等的固定资本投资，降低了这些富国的资本形成率；（3）对富国出口低价消费品，等于变相地提高了富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其可以在维持生活水平不变甚至提高的基础上，把收入更多地投资于金融资产各个项目上；（4）富国制造业由此可获得更高盈利，并把其投入并购和分红等资本市场的虚拟经济活动；（5）中国出口的外汇所得没有用于购买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而是通过不断地购买富国发行的国债甚至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而回流富国。一方面，过多的出口收汇引起国内高比率的人民币投放，从而导致国内处于严重的通胀压力之中。另一方面，这又变相助长了富国的金融泡沫，同时使自己的外汇形态的财富处于不断贬值的危险境地中。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底层的操作工”，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抢占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腾出来的低端就业岗位，但是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却为富国创造了大量的对外需求岗位。全球化其实是对各国就业岗位的争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地位使中国广大的“世界操作工”得到了充分就业，但是却丢失了对高端就业岗位的需求。与此同时，西方富裕国家却一味认为中国的出口毁坏了它们的产业基础和就业基础。如在一篇有很大影响的论文中，Autor 等人（2011）就认为，从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以下的“副作用”：即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与美国同类商品的制造业就业、各地劳动力市场就业负相关，降低了相应岗位工资水平，导致了政府对失业、



医疗保障支出上升。^① 他们把其称之为美国得了“中国综合征”。其实，这种情况也可以反过来看：一方面，这种进口给美国产业结构带来了低成本的调整机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失去了吸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高级要素的机会！

第四，中国制造业是对西方技术最强烈的需求者之一，但却对本国的自主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使中国制造业长期缺少“心脏”和“脑袋”。长期以低端要素进行生产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国际代工，使中国制造业企业无须投资于研发设计和品牌网络也能取得相对“满意”的利润率。这种“温水煮青蛙效应”一方面使中国自身的研发产业和重装备工业因缺少需求无法生存，被西方技术不断地挤出；另一方面，又使其逐步地得了两种病，一是心脏病，缺少核心技术，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手中，中国制造只能引进和高成本地利用人家的技术，或称为“心脏移植”。二是神经病，指“中国制造”的智能化水平较低，软件开发和应用水平落后。

从总量平衡的角度看，可以预料的是，今后欧美在消费上的“去杠杆化”与中国在生产上的“去产能化”，可能是两个并行的、交互影响的必然趋势：前者要求欧美国家增加储蓄，降低过度的消费，后者要求我国压缩或消化过度的生产能力，尤其是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的产能。因此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问题，就中国政府可以掌控的政策工具而言，实施扩大内需策略是实现“去产能化”的最佳方略，由此必然要求中国

^① David H. Autor, David Dorn, Gordon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下载于 nber.org 中的 [PDF]。



走依靠扩大内需来支撑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问题远非这么简单。

第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着“三个比重低”的不良格局，即民生性投入比重低，服务业比重低，中等收入者比重低，这是中国内需难以扩大的主要的需求方的原因和结果。它导致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自我强化，不断形成和累积巨大的过剩产能，加强了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当遇到外部危机时经济必然下行。不解决三个比重过低问题，上述简单恶性循环又会出现。我国“十二五”规划已经将扩大内需战略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2012年我国在“稳中有进”的总基调下，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首次将扩大内需提到战略基点高度，首次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特别是，首次将发展实体经济放到重要位置，强调要抑制以房地产为主的虚拟经济，将资源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但是，由于中国解决经济中存在的“三个比重过低”的不良现象和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奋斗，因此从短期来看，稳定外需还是保增长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不是要不要扩大内需，而是如何扩大内需，以及如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顺利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扩大内需表面上的决定因素在需求方，因此似乎我们解决了收入倍增、分配不均衡以及消费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问题，就自动解决了扩大内需问题。其实，即使我们顺利地解决了需求面的问题，也不等于说就可以顺利地解决本土企业的市场需求问题。真正的难题是在中西方技术水平落差较大的前提下，对中国人需求能力的解决，其结果更多的不是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而是扩大了



对西方过剩产品的强劲需求，甚至是对富国奢侈品的需求！^①因此长期来看，如果不把扩大内需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不提升中国文化自身的自觉和自信能力，不提高中国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本土的过剩生产能力就既无法在出口导向中消化，也无法在扩大内需中消化。

第三，中国现在内需不振的问题，是需求方的问题，更是供给方的技术水平问题。从微观上说，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和技术。因此，解决自主技术创新问题，才是中国扩大内需的长期的、根本的问题所在。过去我们通过技术购买和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学习和模仿为主运用西方技术进行产业升级，但是“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存在着重大的局限性，主要是市场换不来真正的高技术，以学习模仿为特征的技术发展道路存在严重的被阻止性。由此很多学者和官员主张国家要加大对中国本土企业的 R&D 投入和自主品牌的营销投入，坚决走“自力更生、自我创新”的道路。其实，与中国绝大部分重化工业的发展道路一样，单纯的“自力更生、自我创新”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强烈的封闭经济色彩，很难收到像过去那种不计成本的军事工业发展中的实际效果。更多的竞争性的民用产业的发展，还是必须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开放的全球竞争中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高级要素，包括来自西方世界的可以利用的技术、知识和人才，在我方控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中国经济需要在扩大内需中完成转型升级的四大行

^① 如宾利高级轿车 2011 年的销量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次佳水平。宾利在中国的销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 1 839 辆的创纪录水平。中国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宾利第二大市场。



动：（1）产业结构转换，即建立以服务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推翻以土地财政为支柱的经济体系；（2）需求结构转换，即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改造为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3）区域结构协调，即要从根本上扭转东中西三元化发展格局，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4）体制创新，即要打破政府主导的发展态势，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相互关联的四大行动必须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否则就会产生彼此牵制。但是应该看到，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需求结构的转换作用是基础性的，也是最为关键的。如因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差，在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中，制造业增长就受惠于全球市场而服务业发展则受到抑制；而当转向内需之后，以本地化为主要特征的服务业就会得到市场的支持。再如在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中，因“冰山成本”的制约，国际贸易首先发生在沿海地区而不是内陆地区，因此地区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地理位置有直接的关系，那些远离沿海大城市的地区发展就会滞后；而当转向内需之后，国内价值链的作用会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

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基本内容

就学理上说，扩大内需战略并不反全球化，更不会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动相冲突。“扩大内需”指的是利用国内市场，它相对于扩张外需和出口导向而言，与是不是参与全球经济的循环进程没有直接的关系，即扩内需既可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如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并在国内外销售，也可以封闭的方



式进行，如在国内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值过程，不与国际经济发生任何联系。“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趋势，是要素跨区域的、无经济疆界的流动，它只与自力更生经济中要素的封闭流动相对立。因此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强调利用全球优质要素发展自己。在开放条件下，因大国经济的内需潜力大，一般都属于“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而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等，因人口规模的限制，内部市场容量无法消化达到规模经济产量点的供给量，因此一般都是属于“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经济”形态。

客观地说，像中国这样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大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实施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容纳中国这么巨大的生产能力的长期出口，更不可能完全放任本国的产业长期处于中国廉价产品的激烈竞争中。中国逐步回归“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只是在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修正自己的经济系统运行的偏差和原来那种单一的无法持续的经济行为。总的来看，第二波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与第一波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之间，除了在市场需求方面不同外，在基本的战略内容上有着根本性差异，主要体现在：

第一，战略的前提不同。中国所参与的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主要的前提是低端要素的价格具有比较优势，即在国内收入水平较低、国内需求不足以支持高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下，我国的低廉的生产要素所具有的强大国际竞争力。本土对低端要素需求强而对高端要素需求弱，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廉价制造工厂、自主创新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主因。而第二波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其主要前提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主要表现在要素价格正在逐步上升，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我们再也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消耗和占用巨额的资本、破坏国内的生态环境等非均衡发展为代价来补贴外国人。向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提高原本应该提升的生产要素价格，从而使低技术、低附加值和高消耗、高污染的产出丧失竞争力。因争夺内需市场，本土企业会产生对高级要素的强大需求，同时要素价格不断上扬会压缩低端产业的生存空间，由此就会出现创新驱动、生产率上升、服务业大发展的趋势。因此第二波全球化的主要前提是提升要素的质量和生产率，而不是单单凭借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

第二，战略的目的不同。改革开放之初，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紧缺的外汇以进口急需的设备或原材料；后来我国在资金比较充裕，特别是我国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国内流动性充裕、经济建设已经“不差钱”的背景下，继续维持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战略，则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总的来说，其战略目的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国内市场的缺口通过出口解决。而第二波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的目的，则可以概括为“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在中国的创新型经济”^①，国内技术的缺口通过内需吸引国外的要素

① Krugman (1980) 提出的“母国市场效应”理论 (Home Market Effect) 可以解释，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激励企业选择在该国家从事生产活动；一个较大的市场会吸引更多生产差异化产品的企业，并且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缘故，一个国家会倾向于出口迎合本国需求的产品。参见 Krugman Paul R.,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 Amiti M., “Inter-industry Trade in Manufactures: Does Country Size Mat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44)。